

红

旗

飘

飘



27

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

27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封面画：沈 加 蔚

红旗飘飘(27集)

本 社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650×1168 1/32 8.25印张 175千字

198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0月山东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1—30,000册

定价 17.40元(平)18.90元(精)



目 次

深切怀念宋大姐·····	史 良	1
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	张 珏	11
记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	张 莉	15
宋庆龄自请入狱·····	潘大逵	32
“老人年”回忆宋庆龄·····	张 珏	36
冯玉祥与共产党交往片断·····	余华心	40
回忆杨虎城将军·····	孔从洲	71
怀念父亲张治中·····	张素我	92
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	崔月犁	109
陈嘉庚的政治历程·····	洪丝丝	123
高大的身影		
——纪念陶行知先生·····	高 缨	141
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缅怀祖父杨杰将军·····	杨德芬	159

千厮门沉冤

——记费巩教授·····玉如 正棠 180

李林——侨乡的骄傲·····穆 欣 202

从泰国到延安·····庄国英 233

热血丹心献祖国

——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归国参战记···俞炳辉 245

深切怀念宋大姐

史 良

一年以前，也是五月，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一位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伟大女性，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宋庆龄女士，离开了我们。当她病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正住在医院里。当时我的心情无比的沉重，一次一次的病情公告使我预感到不幸。人的生命是多么短促啊！但宋庆龄女士的一生，虽然短促，却给人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我和宋氏三姊妹即孙夫人宋庆龄、孔夫人宋霭龄、蒋夫人宋美龄都有友谊，其中关系最密切、交往最频繁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我总是亲切地称她作大姐，她则经常以我的别字“存初”来唤我。她是我的大姐，不仅因为她比我年长七岁，更重要的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我的楷模。尤其在政治上，宋大姐一直是追求进步的，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因此，这

大姐的称呼,不仅是一种友谊,而且是尊重、仰慕和不能自己的崇敬。

宋大姐原籍是祖国南端的一个迷人的海岛——海南岛,但她本人却出生在上海,和我一样,长期生活在出生地。上海在民主革命中是一个有过光荣斗争历史的城市,我和她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认识的。那是三十年代初期,我刚从法科大学毕业不久,执行律师业务,她已经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了。人们知道,宋大姐从一九一五年和孙中山先生结婚后,即以她的全部生命投入了中国民主革命。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宋大姐就肩负了实现中山先生遗教的重任。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坚决执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向国民党内的右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她郑重地发表声明宣布同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决裂。三十年代初期,宋大姐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她所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面对蒋介石法西斯屠杀的一个战斗组织,正象她自己所说,“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实际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它的英勇实践中,确实为保护和营救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作出了贡献。我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和宋大姐认识并结下深厚友谊的。

前面已经提到,那时我正在作律师的工作。略知一点中国政治实际的人都知道,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靠维护“国定”的法律来保障人权,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懂得法律的人又都知

道，资产阶级的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为了保障资产阶级内不同集团的利益，总是在具体法律条文之间保留许多矛盾和空隙，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律师的职能就在为不同的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从漏洞百出的条文中争权夺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进步的律师，他们的活动并不是出于对《六法全书》的幻想而进行辩护，而是利用资产阶级法律的上述特点，为受难的中国人民和民族工商业者作出可能作到的保护和援助。

我最初认识敬爱的宋大姐就是在这个政治和历史背景下。一天夜里，我已经准备就寝，突然有人来敲我家的房门，说有要事要见我。这种情况如果对于一般人来说少见的话，对我来说却并不稀奇。那时我经常替妇女辩护。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不仅要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欺侮，而且要受夫权的压迫，很多妇女就是在深夜找我，替她们或她们的姊妹申诉冤屈的。哪知来人却不是一般妇女，而是一个学生模样的人。那人递给我一张纸条，赫然写着宋大姐的名字，说孙夫人马上要见我。我毫不犹豫地和来人一齐去到孙夫人的住所，这是我和这位伟大中国妇女、卓越的人民政治家的第一次会见。

那是一个小楼，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就是在这里，宋大姐曾和中山先生一起度过了为革命而日夜操劳的难忘岁月。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她正在书房内等候我们，在不远处闪烁着霓虹灯的光耀，而这里却很恬静。孙夫人一见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丽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着我，给我以信心和勇气。她讲话简短、明确，态度沉着、镇静，眼光坚定、柔和。她告诉我，要积极营救一位革命志士，他的名字叫施义。事后我才知道，我们所要营救的这位卓越的革命家，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邓中夏同志。为了办好这件事，我曾去找过我的一位老

师,我们共同制订了一个策略,就是首先在法庭上提出要求,不许移提。原来施义同志涉嫌被捕是在法租界内,按照惯例,在法租界内的案件,应在法租界内解决,如能作出不许移提的裁定,就可以利用法租界内比较严格的资产阶级法律程序来对受难者进行保护。这个策略制订好以后,在一审中,我就以被告人辩护律师的身份依法提出了上述要求,当庭作了裁定,取得法庭上的初步胜利。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是极为恶劣的,他们早已从叛徒口中得知,施义就是邓中夏,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施义同志终于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引渡到南京,英勇就义了。这是我第一次承办为革命者辩护的案件,这个案件的经过,对我触动很大,它使我懂得,法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要想依靠法律来伸张正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从这个事情开始,我却和人权保障运动开始了接触,继续从孙夫人那里接受许多案件,营救了不少同志。革命事业把宋大姐和我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向我步步进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日军又侵占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得寸进尺地踏进了华北,通过汉奸发动了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在河北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政权。国民党政府不但采取投降妥协政策,而且公然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加紧反共,对中国人民实行恐怖统治,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

一九三五年的一个春天,在一次上海妇女界的群众集会上,很多妇女界人士发表演说,宣传女权。我那时还很年轻,当群众中有人要求我讲话时,我跳上台去,把宋大姐平时告诉我的道理当着大家讲了。我在讲话里着重说了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反帝

抗日是全国人民也是全国妇女的天职，为此必须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我的讲话引起了群众的共鸣，我讲完以后，立刻有人向我伸手握叙，表示支持。这位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是当时地下党的一位干部。会后举行游行，大家呼起了口号，口号的内容正和宋大姐平时常常和我讲过的差不多。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当时的进步刊物《大众生活》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由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同时成立的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救亡运动的发展引起全国各地的连锁反应，一九三五年五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分会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大会宣言，建立了执行委员会，宋大姐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当选为执行委员，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的战斗友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它对后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政治宣言明确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全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恶毒污蔑救亡运动，为从组织上和人身上迫害救亡运动制造舆论。始终支持爱国救亡运动的宋大姐从一开始就察觉了敌人的阴谋。她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致函救国运动领袖，对“全救会”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函件中说：“我们反日的最好办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担保你们将作坚持到底的努力。我们的路是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

胜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三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全市大中学校校长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污蔑“全救会”和“全救会”领导人，毫无根据地把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行动和苏联反日政策联系起来。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和其他“全救会”领导人赴京请愿，并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重申“全救会”的主张，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赞同，极大地支持了爱国救亡运动。同年九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布通令，公然将爱国运动诬为反动，并将为绥远抗敌将士之募捐诬为敛钱肥己。这一通令引起全市人民的强烈抗议，宋庆龄大姐义不容辞，联合马相伯、何香凝等发表声明，严辞驳斥。爱国与反对爱国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十一月，终于发生了爱国领袖被捕的事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二时半，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和我，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外舆论哗然，纷纷通电反对，宋庆龄大姐率先发表声明，声明揭穿了这次逮捕的真相，揭露了它的政治背景。原文说：“余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七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种有背景的逮捕很明显的证据，就是日本报纸今日突又传称余今晨亦为法捕房所捕，罪名是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联系。”声明严正指出：“全国救国会众所昭知的目的，完全是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

我们七个人被捕以后，起先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后来被关

到苏州的高等法院看守所。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提出起诉书，公然把爱国救亡作为犯罪事实而提起公诉。六月十一日进行审理。下面是从“审理记录”上摘下来的我的所谓“供词”：

问：史良，你在全救担任什么工作？

史良答：妇救常委和全救常委。

问：全救大会宣言和纲领是什么意思？

答：团结抗日。

问：你赞成各党各派联合救国吗？

答：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一起抗日的。

问：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

答：救国会的意思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

问：你知道救国会是违法的吗？

答：不知道。我们觉得起诉书对被告等援引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一个国民真的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今日，也只有劝导才是道理。我们并没有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把我们所有的抗日行动和救国主张硬拉到危害民国上面去，不知是何用意？

六月二十五日，宋庆龄大姐为我们的案件写了“呈苏州高等法院文”，参加签名的共十余人。呈文写道：“窃爱国无罪，不待烦言，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具状人等，或为救国会会员，或为救国会理事，或虽未加入救国会而在过去与沈钧儒等共同从事救国工作，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

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
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
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特具呈钧院，守候传讯，伏乞钧院迅予办
理，解天下之感，实为此便。”其后，孙夫人宋庆龄大姐又和其他
十五位爱国人士发起入狱运动。七月五日，宋大姐等带着随身
换洗衣服到达苏州高等法院，求见院长和首席检察官，要求与七
君子同样爱国入狱。孙夫人这一行动，弄得国民党当局狼狈不
堪，受到中外舆论的一致指责。宋大姐为爱国救亡运动作出了
极为重大的贡献，其在当时所起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永远
不会忘记，宋大姐到牢房里来看望我们的情景。当我同大姐紧
紧拥抱时，不禁热泪盈眶。大姐给我们带来了水果和食品，再三
安慰和鼓励我们，她说：“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人民都在
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
阶段，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把我们释放。这是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的事了。

次年，也就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到庐山参加了妇女界抗
日联合组织——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会议。这是国共第二次
合作、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产物。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如邓颖超、
沈兹九、刘清扬等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宋大姐始终关
怀这个组织，并对它的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蒋夫人宋美龄也
参加了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指导长的职务。行文至此，我
在深切怀念宋庆龄大姐的同时，也不能不悬念远在异国的宋美
龄女士（据闻她现在住在美国）。当时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抗
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确实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但其中也充满
了斗争，国民党右翼势力也在其中活动，但由于宋庆龄大姐和
邓颖超同志等在这个委员会中威信很高，影响很大，虽有斗争，

仍不失为一个团结抗日的妇女组织。宋庆龄大姐作为中国妇女的领袖的形象，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大姐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她一生追求进步，不断学习，勇于实践，从追随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到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始终是与时俱进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于一九四六年和共产党公开破裂，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但蒋介石反动派自食其果，人民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前进是不可抗挡的。一九四九年，在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以后，上海终于在五月下旬解放了。我们又重逢了。宋大姐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陈毅同志举行茶会，约集各界人士共庆上海解放。当宋大姐和陈毅同志以及各界人士握手畅叙的时候，她的端庄、美丽、雍容的风度，同胜利的欢乐交织在一起，满面生辉，光耀四座，使人们惊羡敬慕。

上海解放以后，我即前来北京。到北京后，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举行。中共中央正式邀请宋庆龄女士参加会议。周总理就派我返沪专程接她来京。宋大姐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振奋。当人民政协举行会议时，她发表了十分热情的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十月一日，她以共和国副主席身份与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从此，她参加了大量的国务活动，成为国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先在国务院任司法部长，后任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和宋

大姐经常有机会接触，我们有时互相送点小东西作为纪念，有时在一起喝茶小叙，友谊更有增进。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我受到冲击。当我们在一次集会中见面时，她告诉我，她已备悉我在运动中受冲击的情况，深为难过。我告诉她，已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情况正在好转，她才放心。在十年动乱中，我们虽然接触较少，但仍然互相关心。每逢新年，她总是叫人送来一张精致的贺年片，并亲笔书写“祝史良大姐身体健康。宋庆龄”。她的字秀丽清隽，给人以舒适之感。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大姐异常兴奋，大家都好象在绝望中获得新生。一九七八年，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她的精神特别振奋，心情十分舒畅，和全国人民一样，她为祖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欢欣鼓舞，但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病魔却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在她生活在人间的最后时刻，她的政治生命却发展到最高峰。她被批准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她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五月，又是这春光明媚的五月，我怀着无限伤感，深切怀念敬爱的宋庆龄大姐。你的声音笑貌和磊落风范，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你的事业正为千万后继者所承担，你对祖国和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必将一步步地实现。

敬爱的宋大姐，全国人民公认的“国之瑰宝”，让我们永远永远地祝福你，你是永垂不朽的！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北京

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

张 瑶

宋庆龄主席逝世将近一年了。她在北京的住宅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当我们步入她的故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她的一幅半身像。她面带微笑，神态庄重，身着深色的衣服，配以深色带白鼯图案的围巾，仪态万方。每次路过这里，我总要情不自禁地止步回忆。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是这样风度。她到办公室看工作人员时，步履轻快，所到之处，留下一种清香，正象电影《国之瑰宝》序幕里那种荷花的清香，经久不散。

十几年前，一次午餐后，她服药时曾对我说：“我知道许多药名和怎么服法，都是孙先生教我的。”说这话时，她面带喜色而且引以为傲。



又一次午餐时，她说：“每逢他的诞辰或逝世纪念会，我不愿参加。因为，要想起他在世的情景，会难过的。”

在这幅像前，又使我回忆起她给我写过的话：“那时我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屋里放下窗帘。（指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日子里）……。”

这里把她写过的话简述一下。

宋庆龄由于她父亲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同盟会会员，当年的外国朋友称他为“Charlie”即查理）的关系，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宋嘉树八岁时到了美国，毕业于范德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在美国遇到孙中山向学生演讲中国革命的必要，由见面认识逐渐成为好友，一起旅行。二十岁时被美国教会送到上海教圣书。

宋嘉树在上海住宅密设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小册子、讲话等，也印基督教书。孙中山每到上海，夜深时必去宋家。当时宋家姊妹兄弟还都处在少年儿童时代。父母告诉他们不要声张，禁止拿印好的革命册子。那时，倪桂珍（宋庆龄的母亲）也承担了爱国的任务，进行秘密工作。宋嘉树还在经济上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后来流亡日本。

一九一三年宋庆龄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的韦斯里安大学（Wesleyan College, Macon, Georgia，一所女子大学），原想再学习一、二年。她的父亲急电召她去日本。原来，她的大姐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因结婚离职，由她父亲接替。她父亲患肝病，不能长时间席地而坐，从事书写，因而急电。这样，宋庆龄不能继续学业，应召到日本，和父亲住在横滨。每天由父亲陪往东京赤坂区灵南二十六号孙中山处工作，并尽快地学习秘书工作。这时她担任密电码保管和外文复信，宋嘉树为革命筹款。